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针对妇女的暴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斯人已逝，言犹未尽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海上书展纪事

罗德岛的自由

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上)

吴强

——现代的民主是后RAF的民主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夏佑至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灵子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夏佑至（上海）

凌越（广州）

贾葭（香港）

孙传钊（上海）

灵子（北京）

言一（成都）

朱航满（石家庄）

林建刚（天津）

刘柠（北京）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孙骁骥（北京）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扬克（德国·图宾根）

吴强（北京）

朱白（广州）

朱航满（北京）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5年1~2月 第9卷第01期

总第76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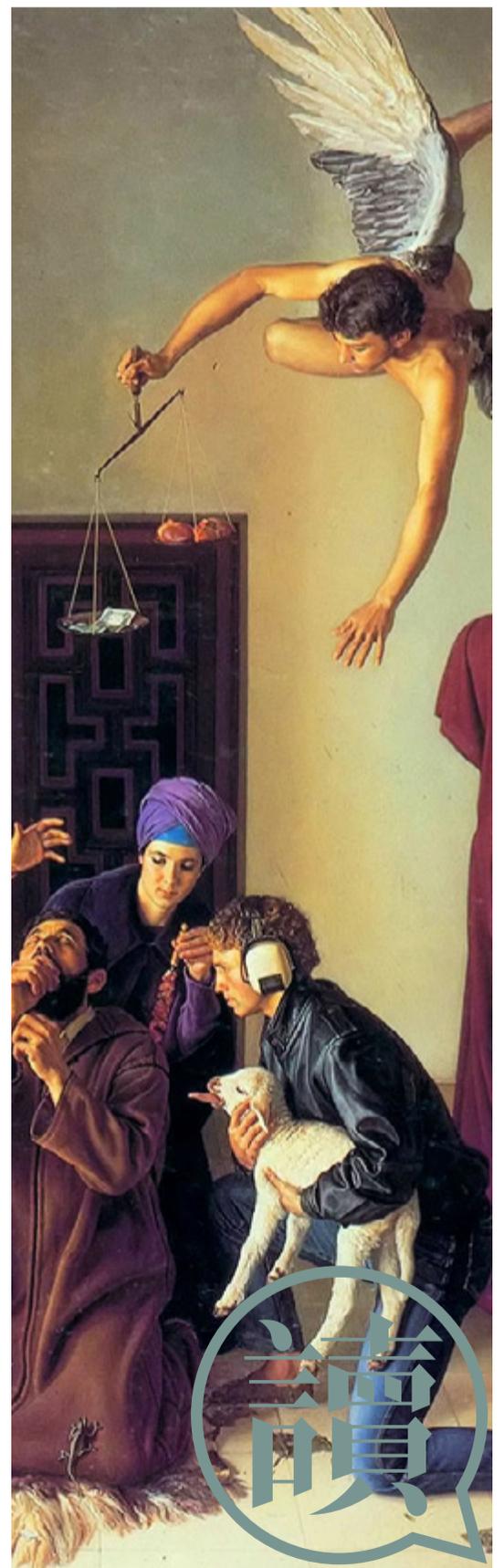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http://www.chinairr.net/issues/>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由于不可救药的拖延症，本该春夏之交问世的这期“独立阅读”，在秋天编好，见到诸位已经是冬天了，从2014年5月直接到了2015年1月。编辑当天，恰逢秋分，北京细雨连连。微博微信里，不巧一条条都是令人沮丧、无言的消息。此时此刻，身处自然与精神的双重阴霾里，有些不知该做如是想，如是观。想着那些曾认真思考、努力做事的人，似乎也不免鸡蛋碰石头，换来一个无益甚至自损的结局。

不过，就因此什么都不想不做吗？大概即便偶然有这样赌气的打算，也是无法贯彻的。在仔细阅读本期文章时，越发打消了这种无力消极。乐观与勇气即便在现状中显得虚妄，也该抱定继续下去吧。或者正因如此现状，才更见出它们的珍稀与力量，以及秉持者的决心。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Magician
Gaudio Bravo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王晓渔（文史）

005-007

书评

- 吴强
针对妇女的暴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 田方萌：
斯人已逝，言犹未尽
- 王弘治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008-021

随笔

- 刘柠
海上书展纪事
- 罗四鸽
罗德岛的自由

022-028

出版

- 刘柠
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上）

029-036

访谈

- 灵子
吴强
——现代的民主是后RAF的民主

037-045

王晓渔

世界杯开幕前夕，巴西却后院起火，民众不断进行街头抗议。这在个别大国看来，不免有失颜面，“拉美式民主”更是常常被用来证明民主的失败。美国学者彼得·H.史密斯先生在《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8月）里坦承，就经济而言，“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成功（或一样糟糕）”。随后，他审慎地说：“然而，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民主国家似乎优于独裁国家。这一结果是否会维持住人民对民主统治的支持，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本地区的许多人来说，威权统治仍然是一个诱人的选项。”2006年，时任巴西副总统参观了北京史家小学的“后现代主义式校园”，回国谈到观感，自愧不如以至于潸然落泪。这一消息传回中国，增添了不少民族自豪感，可是，巴西的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超出中国。

“民主国家可能带不来更多繁荣，……但它能够更友善、温和地对待本国公民”，史密斯这样说。允许公开的反对，也是友善和温和的一部分。只有四五百万人口的哥斯达黎加在世界杯上从“死亡之组”突围进入八强，让球迷感到震惊，但不为人知的是，哥斯达黎加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在巴西和阿根廷之上，比足球排名高出许多。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另辟威权之蹊径，一度让个别形



单影只的国家感到“对影成三人”的欣喜，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论拉美的民主》指出，除了查韦斯，“所有的粉色浪潮领导人都支持政治民主的基本制度，包括信任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史密斯寄望拉美能够成为“一个广泛的政治实验——左中右三翼——交织于民主之路的地区”。偏左或者偏右，偏重平等或者偏重自由，在民主的框架里都是选项之一。如果越出了民主的框架，就会演变为斯大林式或纳粹式的政制。

苏俄对于20世纪的中国影响深远，至今挥之不去。此前曾经读到俄罗斯学者维

克托·乌索夫先生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明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最近在朋友的提醒下，刚刚注意到姊妹篇《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明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1月）也已出版。两本书由于装帧非常相近，很容易被混同为一本书。作者通过研究指出：“现存文件和材料清楚表明了20-30年代给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规模，这种规模实际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组织的活动，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现实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原因，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访问苏联期间，出席了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并且表示：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中共代表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历史在你们身边》（三联书店，2014年9月）是林达近作的结集，没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和《西班牙旅行笔记》那么系统，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无论所写何处，均以当下的中国作为关照对象。在代序中，林达讲述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的出版过程：几乎所有接触过的出版社都认为这是好书稿，但也都认为主题敏感，不能出版；一家文艺出版社对书稿做了大量删节，并且表



示只给样书不给稿费，作者答应了，但书稿最后还是被否决；后来，书稿被送到三联书店，没有什么删改就出版了；再后来，这本书的命运就众所周知了，一纸风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老大哥”，这种自我审查最终使外在审查变得全面而有效。林达和徐贲，是两位身居海外却有着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的写作者。徐贲先生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讨论了公共交流的基本规则，这像形式逻辑一样，需要“从娃娃抓起”。

增订版《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以前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补上。早已脱销的《穆旦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据说也将再版，让人期待。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位网友说，

他在大学时开网店，拿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拖去化纸浆的几十套《穆旦译文集》，以四折的成本拿到，八折的价格卖出，大三大四的学费、自己买书的钱，基本就来自这几十套《穆旦译文集》。《穆旦译文集》竟然有这个效用，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新版《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是对离世已有十五年的苇岸先生的最好纪念。这本书新收了苇岸关于廿四节气的照片和部分日记，无论封面装帧还是内页设计都很用心。只是不知何故，旧版《大地上的事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自序未能收入此书。回顾苇岸的写作，最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廿四节气》的写作，这原有可能成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阅读残篇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象完整的《廿四节气》和照片单独成书的模样，可惜这部书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了。我不同意苇岸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立的倾向，但是苇岸对植物、泥土、天空、飞禽走兽的书写是不应被遗忘的。Q

针对妇女的暴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吴强

也许因为目睹了一场大屠杀，现场体验是如此震撼，纽时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夫妇在过去的25年里孜孜以求，追寻着人类的各种暴力。从这场诱发苏东阵营爆发“天鹅绒革命”的屠杀到南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他们先后获得两次普利策奖。不过，他们最新的著作《天空的另一半》，却展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暴力，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妇女的暴力，其范围之普遍、偏见之深、漠视之甚，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些针对妇女的暴力，从强迫卖淫到强奸、割礼、教育歧视、孕产妇死亡和贫困，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构成了一幅21世纪的奴隶制图景。因为这些暴力形式的存在，无论割礼还是强奸或者教育歧视，都维系和再生产着社会的暴力，而非仅仅是针对个别女性或特定女性群体的，例如印度的低种姓女性普遍的强奸威胁，一方面维系着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另一方

面，表面上受到尊重的中产阶级女性，从这一暴力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却也被迫更加依附财产关系的婚姻制度。而在巴基斯坦，对女性的轮奸甚至可能是部族领袖发出的指令，强奸成为统治的工具。结果，是整个部族的女性，或者女性作为一个阶级，沦为男性的奴隶，不论她是属于单个男性还是属于男性主导的社会，没有例外。

这一真相，恐怕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在21世纪，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女性的暴力，仍然是统治的方式，甚至统治技艺的核心，却又受到如此严重的忽视。人们似乎更关心那些国家的公民权利、政治参与和经济繁荣，鲜有人将这种赤裸裸的身体政治与威权的持续或者民主发展的障碍相联系。

如果与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等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女性的状况表面上似乎好得太多，不需要过多担心被强奸、被割礼，女童就学、产妇保健、经济自主、女

性就业等指标要比这些昔日的第三世界同盟进步许多。但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否有着实质性改善,或者以其他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呢?因为,针对女性暴力的研究表明,对女性的偏见往往是导致暴力的原因,而各种偏见的普遍性则决定了暴力形态的普遍性和隐蔽性。例如,在非洲,割礼是如此普遍,倡导割礼的组织甚至受到母亲们的强烈抵制,原因无他,她们担心拒绝割礼的女儿可能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上被排斥,嫁不出去。在偏见的驱动下,这些母亲们自己充当了暴力的代理人,一代一代再生产着对女性的暴力。

类似的,几乎肉眼可见、习以为常的女性歧视背后,也都隐藏着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着三个层次:语言暴力,这一最为根本的象征性暴力;伴侣、家庭关系中的暴力;和以父爱名义滥用的国家暴力。这种划分可以揭示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各种暴力形态,从职场的潜规则、饭桌上的荤段子,从就业和高考时赤裸裸的女性歧视,从婚姻市场上剩女的歧视,到李阳的家庭暴力,到招远麦当劳杀人案,到针对性工作者的收容教育制度,再到整个以暴力为中心的洗脑、专政体制,都存在在逻辑的关联和一致性。

而这一逻辑,按照齐泽克对暴力的溯源,可以类比种族间的暴力原因,因为理性(reason)和种族(race)两个词都有着相同的拉丁词源——ratio,计算或逻辑,意味着基于差异的对立关系及其背反产生着所谓纯粹理性,由此贯穿着古希腊以来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教徒、反犹太、



《天空的另一半》
(美) 纪思道、伍洁芳
吴茵茵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白人对黑人、富人对穷人、乃至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和战争。当前述一切对立差异都被暴力本身、政治正确或者文化主义所化解,如詹姆斯·希恩所观察的暴力的衰落,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仅存的也是最古老的差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便成为暴力的核心。

男女间差异及其对立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男女的性别分工,狩猎与采摘。狩猎需要的是暴力、合作以及长跑,也发展出以消灭生命为威胁的暴力组织,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人类社会暴力尤其是国家暴力的终极本质。作为哺乳动物中最能长跑的物种,长跑帮助人类不断进化,发展出褪去覆毛的体表降温系统,地形记忆和长期能力加强,大脑增大。在此基础

上，狩猎所需的集体行动，也就是组织方式，一开始就朝着暴力组织方向发展，并且随着长跑能力的增强而迁徙、征服其他部落。但是，只有女性主导的采摘和种植才可能弥补两次狩猎间歇带来的热量与蛋白质缺乏，保证人类组织的存续，实现定居，人类的文明因而能够通过定居在更长期的时段内得以延续。

因此，男女间暴力-迁徙和种植-定居的差异，相当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性别对暴力的不同态度。但是，随着定居文明特别是城市共同体的发展，暴力随之趋向定居化，愈加内向化。即使蒙古人，如杉山正明所总结的，在进行世界征服大业的同时，也随之将粮草后勤基地规划为“大都”，按照阶级和分工来分配居住空间，形成蒙古式的城市模式。而且，这种围绕着暴力-权力中心的需要而规划空间的居住模式，而非欧洲自由市在教权或王权庇护下自由人的自然集中，不仅为明朝-清朝所继承，在今天仍然继续统治着中国的城市空间，并且其暴力指向从语言到家庭关系到国家暴力，从未间断。有趣的是，最近一些年轻学者从明朝继承北京提出明王朝胸怀草原的帝国理念，罔顾蒙古化都市形态本身切合明朝专制统治的内在一致性。

所谓语言的暴力，也许最好表明了暴力的任意性，可以轻易地利用知识的垄断和表达工具的控制，之间将任何人类差异对立化，形成社会关系的暴力，而无须诉诸死亡威胁。反之，如齐泽克所说，反抗暴力的捷径，或者抗议本身，就是寻求语言的暴力，从中获得解放。这大概最好解

释了无能者的力量，口炮可能是无能者唯一的反抗，无论嘲讽还是反对。但是，对中国女性来说，首当其冲的是男性霸权的语言无所不在，无时不刻地再生产男女的不平等。例如，各种以女性为对象的三字经、黄段子在几乎任何人口中、任何场合都无顾忌地使用，包括女性自身在内在日常谈话或称谓中大量使用小姐、剩女、美女等，鲜有人反省其中包含的男性霸权。与此对应，各种对女性的歧视，从教育到就业，从工资待遇到待人接物，从男女厕所空间到精英流动，无不充满男权中心的权力统治关系，而这些不平等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并未因为市场经济或社会改革而缓解，反而持续强化与巩固。

女性的身体在这种语言暴力下被物化，乃至婚姻制度，如同欧洲19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际女性被迫服从于财产主导的婚姻关系，愈益成为财产的附庸，而女性在离婚后根本难以获得充分平等的权益保障，从子女抚养权到财产分割。特别是“包二奶”风气，和法国持续到二战的中产阶级蓄养年轻情人的风气，或者纪思道和伍洁芳笔下非洲大叔们蓄养年轻女孩的风气并无多少差别。在许多中国NGO内部，也充斥着强烈的男权气息，女性主义并未进入他们的政治正确辞典，一些著名公益组织甚至拒绝考虑资助女权组织，担心与其主流价值“冲突”。

这些语言暴力，最终都将转化为对女性身体、心灵和自由的剥夺，包括强奸、性侵和各种支配、控制。即使在美国，据FBI的统计，近年来每年平均有1500起丈夫和

男友对女性的谋杀；而司法统计局较早的数据，仅1992年一年就发生了380万起性侵、50万起强奸案，而其中75%都是来自亲密关系的伤害。在中国，虽然无从查得确切的每年强奸案和性侵次数，但是大概很少有人会怀疑实际强奸案的发案率被严重低估，性侵次数更被到处弥漫的“职场潜规则”所掩盖，只有更为悲催的另一面：不时见诸报端的留守女童被性侵，以及趋向最为极端的暴力趋势——世界最高的妇女自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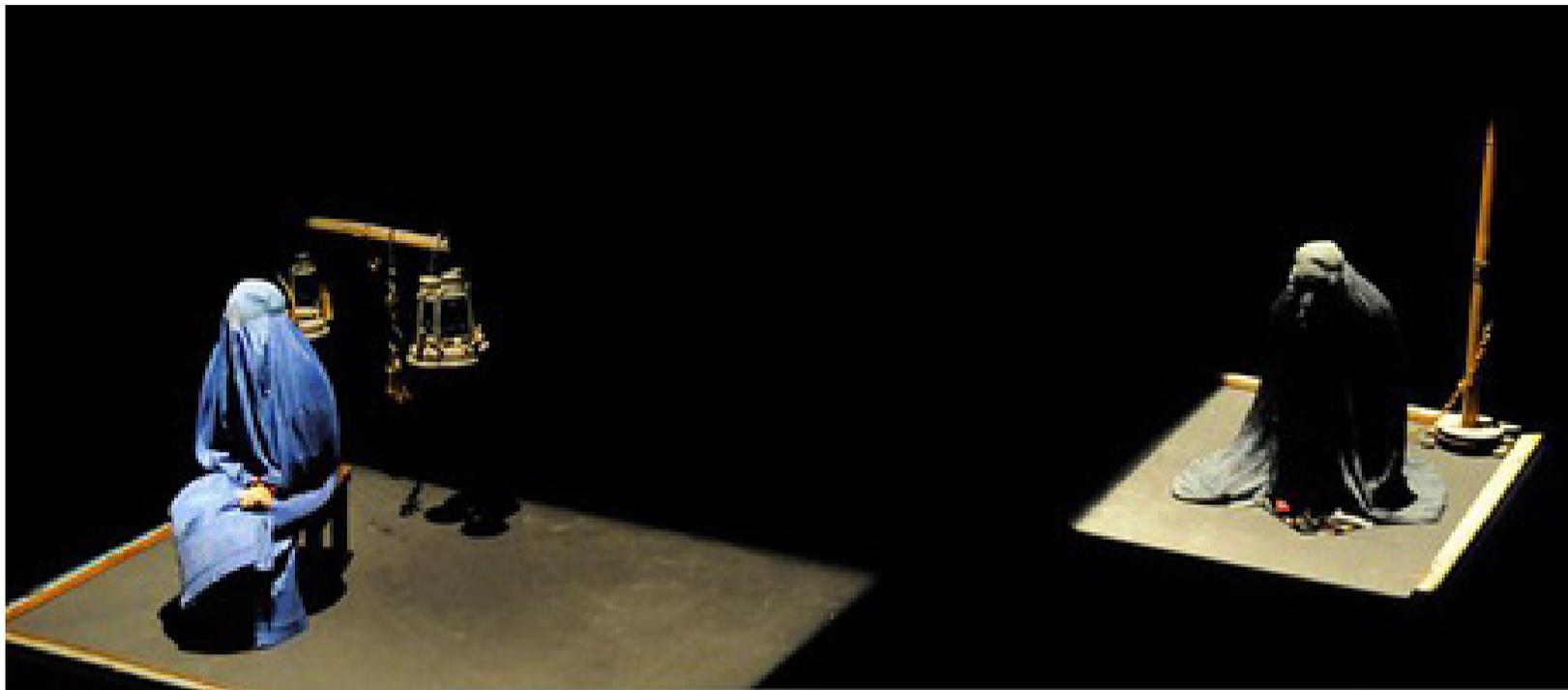
有文献表明，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每年自杀人数平均28.7万。而1990年以来，中国妇女的自杀率从十万分之十三稳步上升到十万分之三十左右，妇女的自杀率超过男性25%，这一现象世界仅有，而且中国妇女每年自杀人数占世界每年自杀妇女总和的56.6%（1999年）。其中，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又是城市妇女自杀率的三倍。无论是否可用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来解释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导致自杀这一最极端的自我暴力的主因，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本身很大程度上都可自我解释为来自家人和亲戚等血缘关系的压力。

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熟人、同事与上下级关系等非亲密关系，往往也习惯超越普通人际关系，侵入隐私空间，形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而所谓“潜规则”不过是其一面而已。结果，来自亲密关系对女性行为和自由的限制极其普遍，典型如婚姻关系中男方和几乎所有亲人对女性自由的限制、大龄女性面对的严重“剩女”焦虑。特别是婚内强奸问题，至今得不到

中国法律的正式承认，仅有的一件立案把婚内强奸苛刻的限于离婚协商期间的强奸行为。如果考虑到按自杀年龄分组，过去二十年上升最快的居然是4-15岁组女性，与近年来激增的校园屠童案、留守女童性侵案、甚至与“父母即祸害”、“春节返乡恐惧族”等等豆瓣小组互参后，那么，传统的亲密关系，甚至爱，因为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最后都沦落为暴力的领域。

进而，当我们把性关系理解为正常亲密关系中的交往行为，那么，身体与金钱的交换，便可以理解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扭曲、或者悖反，即所谓理性。沿着亲密关系暴力的进路，嫖妓便也可能解释为齐泽克意义上暴力的本质——对爱的领域的占领。也就是说，任何性交易对女性来说都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如果追溯到女性从事性工作的初衷，也许不过是介于几种暴力形态之间相权取其轻，所谓自由性交易的真相。早在20年前1995年的北京世妇大会上，美国的法雷博士，公布了一个研究结果：在被调查妓女中，57%曾经在孩童时期受过性侵犯，49%受过暴力伤害；在卖淫生涯中，高达82%比例的妓女遭受过身体伤害，83%被武器威胁过，68%被强奸，84%曾经或者处于无家可归。也就是说，与自杀类似，性工作可能同样是性暴力的结果。

即使在市场自由条件下，许多女性“自愿”选择性工作，也是亲密关系的剥削结果：基于为亲人筹措生病、上学费用、甚至婚娶费用等，为之做出牺牲，包括放弃教育机会、缺乏劳动市场上的足够竞争力



来自巴西的话剧《喀布尔安魂曲》，深刻展示了阿富汗社会仍在持续的妇女暴力。

等。而大部分性工作者，特别是底层性工作者，根据亚促会的调查，约60%在接客过程中因为男性顾客的需要而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男性强加的身体暴力在所谓自由性交易中再次显露。而中国现存大约300万左右狭义上提供插入服务的职业性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更广义上从事足按、全身按摩、色情表演等一切引起性欢娱的服务业者规模可能高达数千万，再考虑到前述每一个自杀女性的数字背后通常还对应着10到20位自杀未遂者，也即每年300到600万自杀未遂女性，不难想见如此巨大规模的亲密关系和暴力关系在市场中的相互替代，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或者阶级，如何超出想象地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

但是，更重要的，无论对这些被迫从事性工作的还是所有女性，暴力不仅来自性侵经历、亲密关系的压迫、和性交过程中的安全威胁，还来自制度化的暴力，即警察暴力或者国家暴力。如果留守儿童性

侵、家庭暴力、招远麦当劳杀人案、专挑性工作者下手的犯罪等等暴力形式，仍然无法让冷漠看客逼近暴力与女性的关联，那么国家暴力对暴力的垄断性运用并加诸女性身体，或许可以揭示中国女性承受的来自亲密关系和国家的双重暴力。

只不过，国家暴力对女性的压迫，要比市场的呈现更为隐蔽，往往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化着，却更有效。这个漫长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四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对传统封建伦理的颠覆，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发展出有力的女性理论，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颇能解释革命之后的反动，如斯大林对革命的否定，妇女被革命动员之后的命运同样是被否定：领导人行列里再也没有向警予、蔡畅之类的女性领袖；曾经创造“妇女能顶半边天”神话的中国妇女运动，趋于官僚化、体制化，高高在上脱离了女性，成为男性统治阶级的附庸；建政60多年的政权，虽然机构臃肿，但至今没有建立一个妇女或家庭

部，负责女性权益和福利；当“文革”结束、毛派下台，官僚力量重新掌权，自“三反、五反”以来连续三十年以消灭肉体的阶级斗争虽然休止，但是却诞生了一个新的与女性为敌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气氛下，通过强制推行节育措施，动员基层行政力量和卫生手段侵入每一位成年妇女的阴道、子宫和输卵管结扎、上环，监视她们的生理周期，强行堕胎，并以取消福利、职位、工作、和高额罚款等手段威胁、惩罚。结果，人们日益龟缩在家庭的脆弱生命联系中，社会价值观逐渐保守化，个人行为与国家目标实现了统治技艺所追求的完美和谐。这正是国家暴力的现代特征。

当然，这些都不算最严重的。继“严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1987年开始的“扫黄”运动延续至今，成为1949年后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暴力动员，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严打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对象却是所谓卖淫妇女，并开始了大规模地对卖淫妇女实行收容教育，一种变相的妇女集中营，不能不让人回想到1620年率先在汉堡开设的惩戒所、1657年路易十三设立的国家收容总署、以及1697年英国布里斯托建立的第一座贫民习艺所。遗憾的是，这些福柯意义上带有中世纪残余的对流浪汉和贫民的收容、惩

戒手段，却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死灰复燃，甚至在2013年为人诟病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废除后仍然延续，而且专门针对妇女，特别是底层妇女，以国家暴力限制她们的公民人身自由。从1987年至今，估计有近50万妇女遭受过收教，每年约2.8万人被收教，收教期从半年到两年不等。

这一情景，另一半天空的阴霾，纪思道和伍洁芳恐怕也没有发现。再对照他们笔下的第三世界妇女竞赛的各种暴力，从强奸到割礼，似乎显得是那么前现代了。甚至纪思道或者安吉丽娜·朱莉等大力推动、以国际NGO和联合国人权机制和消歧公约的方式来改善的手段，也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能否真正面对一个系统性的国家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实在多少有些可疑。何况，俄、中以及美国里根时代的保守右翼最近共同鼓吹回归保守价值，俨然将对妇女的暴力的价值观升华为全球战略同盟的高度。一些鼓吹儒家价值的团体兴起，组织“女德班”全国巡回培训，最近还进入了北京社区，专门教导女性如何顺从，与鼓吹“缠脚”、割礼并无本质不同，再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意味着，只要这一强大的威权体制还在继续，每天生活中，世界的未来，针对妇女的暴力就不会停止。○

斯人已逝，言犹未尽



田方萌

手头一堆新书，我仅凭标题，先抽出了这本《人之将死》。我对死亡充满了兴趣，对与死亡有关的事也充满了兴趣。战争、谋杀、遗言和墓地，这一切都令我着迷。在我看来，死亡最能迫使人们显露出真实的本性，去回答那些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

濒死体验像一次奇异旅行

死亡不只属于老年人，任何年龄的人们都面对这一风险。有些人等不及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前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突发脑溢血，在饭桌上一头栽倒，两天后便不明就里地去世了。老人们虽然对死亡已不陌生，但很少有精力为之深思并诉诸文字。相较而言，克里斯托福·希钦斯是幸运的——他将自己死前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本书。

希钦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外交政策》前几年搞了一次全球公知评选，他位居第五，在哈维尔之后，哈贝马

斯之前。其人文风凌厉，咄咄逼人，笔锋所指，包括基辛格等地上名人和耶稣等天上神仙。也只有等得了绝症，这位一直专注于公共事务的斗士才开始关注自身：“患了癌症就永远忍不住要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唯我独尊。”像世间很多事物一样，唯有失去才知晓其意义。《人之将死》可以看作死神逼迫希钦斯交出的一篇命题作文。

希钦斯起初对绝症毫无准备。2010年入夏的一天，他在纽约的酒店房间里突然感到胸部剧痛。“……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感觉好像被捆在自己的尸体上。我的整个胸腔似乎被彻底掏空，然后注入缓缓硬结的水泥。我能听到自己微弱的呼吸，但无法让肺部充气，心脏不是跳得太强就是太弱。任何动作，无论多细微，都须要事先筹划。”他很快被护送至医院，并以诗意的笔调记下这一切——“从健康人的国度穿越蛮荒的边界，到达病患之地”。

濒死体验在希钦斯看来就像一次通往

奇异世界的旅行：“新的国度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敞开。人人都带着鼓励的笑容，而且似乎完全没有种族歧视。那里洋溢着一种广泛的平等精神，管理者显然凭借美德和勤奋取得了今天的业绩。”他随即笔锋一转：“然而，这里的幽默有点儿病态和重复，几乎没人谈论性事，菜肴也是我去过所有地方里最差的。这个国度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成功做到既枯燥又难懂的混合语，包括像昂丹司琼（Ondansetron）这种抗恶心剂的药名，以及某些令人不安的须要逐渐适应的手势。”

人们常会谈论两极相通的一个例证，即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像婴幼儿一样，绝症患者居住在一个强迫他们社会化的场所，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生命。无论多么疼痛和厌恶，那里的居民都必须接受药物和手术，而它们往往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仿佛要提醒人不忘原初，希钦斯发现他那些成年人的特征逐渐消失了。他的嗓音变得短促尖利，像小孩发出的吱吱声，而他的上唇也变得像做过电蚀脱毛那般光滑。通往死亡的历程好似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滑稽、怪异、格格不入。

过了几个月，社会化完成了。希钦斯对病患的国度习以为常，医生也适时地提醒他考虑后事。纵一世风骚，他也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记住，你也是凡人，终有一死。”《人之将死》的最后一章显得语无伦次，因为那是希钦斯断续记下的只言片语。他临终前想到电影《筋疲力尽》，想到古希腊悲剧，想到《纽约客》讣闻版的漫画，也想到索尔-贝娄的话：“如果你想看



《人之将死》
(美) 希钦斯
赵菲菲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6月

见东西，死亡是镜子必需的黑色衬背。”

这就是一位作家死前的自我写照。希钦斯于2011年12月15日在美国休斯敦逝世，享年62岁。

无神论者的生死观

唐人杜牧诗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今天孙燕姿唱的流动歌曲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到。”死亡实属必然，可人们更关心其中的偶然性。对于“为什么偏偏是我得了癌症”的问题，科学的解答有其限度，因为它只关注基于总体的一般规律。现代哲学深奥难懂，也不令人满意。无论上帝安排或转世轮回，只有传统宗教为个体死亡的偶然性提供了普遍适

用的答案。

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一年，我租住了华盛顿郊区一间公寓。房东是位102岁的白人老太太。她这个年纪的人，每年有五成以上的概率离开人世。不过，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看上去很是淡定，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只是服从上帝的召唤罢了。这里我不打算争辩是否存在天堂之类的神学话题，只想强调宗教信仰对于我们如何看待死亡具有重大影响。

当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不向同一个上帝报到，还有人根本不向任何上帝报到。后者不能依靠宗教得到安慰和解脱，希钦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著名的人之一。在无信仰者（nonbeliever）的群体中，他与英国学者道金斯齐名，曾写下《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无神论者的口袋书》（The Portable Atheist）等专著。在教众们看来，他是个没救的人，至死都在和上帝对着干。他在书中写道：“就算噪音先我而去，我也将继续用笔和宗教妄想辩论……”

在希钦斯看来，他并不需要宗教的慰藉，因为死亡的偶然性问题是不成问题的。生命就像一杯逐渐蒸发的水：“……在正常的人生中，你发现每过去一天都意味着减掉的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这样的趋势残酷无情，不可逆转。”既然不可逆转，你就没有选择，只有视其为理所当然。希钦斯认为偶然性问题的提出就很荒谬——“对于‘为什么是我’这个蠢问题，宇宙几乎懒得给出那个回答：为什么不呢？”尽管他在死前尝试过多种疗法，每

一种或多或少都有治愈他的可能性，关于偶然性的话题还是被他轻蔑地回避了。

也许，像希钦斯这样的无神论者更看重死亡的必然性。他自认为战胜了上帝，却不得不承认自己败倒在死神脚下：“任何所谓病后康复，其实都只是一个存活期的问题，你所谓的战胜癌症，也许不过是十年后死在别的病上，因为最后胜利的那个一定是死亡。”另一位无神论者，悲剧哲学家叔本华也说过类似的话：“到了最后必然还是死亡战胜，因为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

然而，无神论者对死亡的解读却大异其趣，这种差异源于他们看待生命的态度和角度。在叔本华眼中，人的生命就是一种苦役。既然如此，我们至少应当怀疑活着是否好过死去。根据他的生命体悟，只有死亡才是终结生存痛苦的安慰剂。他甚至蛮有把握地替逝者作答：“假如我们叩问坟墓的死者是否愿意重新做人，他们将会摇头拒绝。”显然，叔本华做出了错误的全称判断，他将自己的负面情感强加到大多数人类成员身上了。

在《人之将死》的结尾处，希钦斯摘录了小说《爱因斯坦的梦》的片断，强调永生不死的代价就是我们生活在前人的阴影下，因为他们也不会死去，因而没有人是自由独立的。这算是肯定死亡的一个理由。类似地，我们可以说死亡的意义在于逝者为生者腾出空间，否则地球上早就挤满了人。这种从人际关系角度理解死亡的观点不乏趣味，但我依然觉得，只有像叔本华那样，从个体生命性质去体察死亡，才能发

现真正触及灵魂的哲理。

死亡为何总会留有遗憾？

希钦斯是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他的生命是服务于公共辩论的。在得知患癌到去世之间的一年半期间，希钦斯笔耕不辍，写出大量政论文章和文化批评。对一个作家，这似乎是最好的死法，也是最崇高的死法。舆论为此而感佩，读者为此而涕泣。英国作家麦克尤恩（Ian McEwan）这样评价希钦斯：“他是最完美的作家，……他燃烧自己，‘闪烁着宝石般灿烂而刚硬的光华’。直到最后。”

希钦斯自己也表达了为事业死而后已的信念。他病倒后反而觉得“辩论和讲座像空气一样成为我生命的必需”，“写作不仅是我的生活和生计，也是我的生命”。即使肉身尚存，停笔也意味一个作家的精神死亡，希钦斯难以接受。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在这位大科学家的晚年，生命的意义对他来说只在于能否研究物理学。这种人似乎只知一种活法，也只求一种死法。死亡对他们并非自然的人生尽头，只是打断了奋斗不休的努力而已。

然而，这种活法让希钦斯永远不可能获得生命的满足感。他在死前自称被一种徒劳感深深地折磨着。“我给自己的下一个十年制订了切实的计划，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努力挣到这十年。我真的看不到孩子们结婚么？看不到世贸中心再次拔地而起？读不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这些老家伙的讣闻，即便那不是我亲自撰



写的？”他不得不放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

在《人之将死》的后记中，希钦斯的妻子回忆了丈夫最后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等不及（出院后）补看错过的所有电影，看休斯敦举办的埃及法老图坦卡门展览。终点突如其来。”无论希钦斯的名声多么显赫，他的死依然和一个普通的现代人一样，留下一大堆没有实现的遗愿。我们可以想象，即便他晚死十年，依然如此。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我们的时代被进步观念主导着的，发展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个人无论何时死去，总可以期待更多。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早在上世纪初就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特征：“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

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

传统社会却并非如此，一代代人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祖先的生活。某人如果活得足够长，便会经历他所能经历的一切，从而不留遗憾地平静死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命不仅永远得不到救赎，而且被无限进步稀释得鲜有意义。这恐怕是我们为现代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或许我们可以采取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立场，他认为生命不必完美，因为完美也是不一种不完美。这条听上去像诡辩的理由并不有力，因为未来已给我们期许太多，以至于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相较而言，我更欣赏苏格拉底的求知态度：“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除了宗教学说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偶然性问题的答案？现代人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能否在死前进入圆满自足的境界？希钦斯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可以思考这些问题。🔴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王宏治

用这个题目评点阿城的新作《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并非起意要否定关于这部装帧精美之书的一切。《北齐书》中载《魏书》的作者魏收攻击文敌的话：

“伊常于沈约集中做贼，何意道我抄任？”抄得光明磊落，竟也无妨。阿城在这本新书中时时向社科院考古所教授冯时致敬，声明书中有关的观点均出自冯时在本世纪初结集出版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冯书第八章“天数发微”主要讨论天文考古学背景下河图洛书的起源之秘，阿城全书有关洛书河图的基本观点，全来自于此。包括宋代蔡季通发现的河图洛书与苗族之间的可能联系、河出图之“河”乃指天上银河，及相关插图，读者都可以在冯时著作中一一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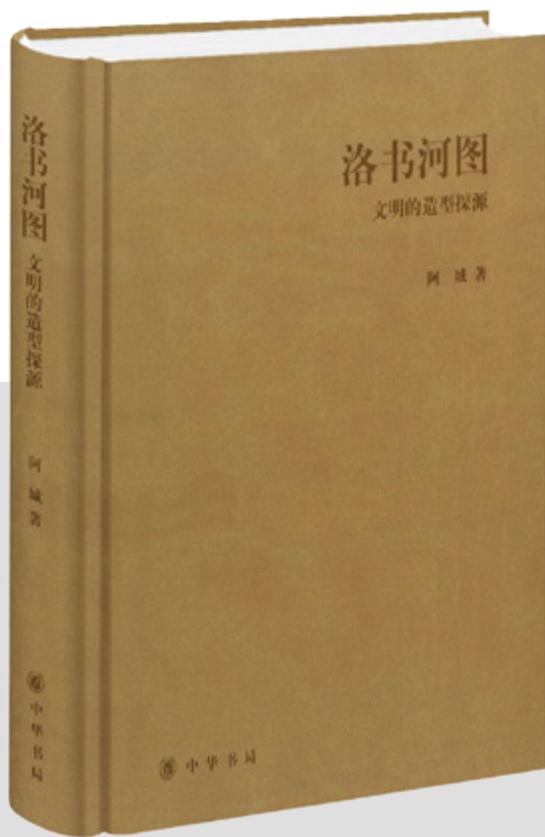
阿城把自己的新作称作文化随笔，其大部论述内容，犹如冯时原著的通俗转写，当然要求于读者的知识门槛也低了很多。冯时的天文考古学在专业圈子外，大众极

少有认知，前不久窦文涛在自己栏目里介绍《洛书河图》时对冯时的研究显然不甚了了。冯时在上世纪末即已提出天象在古代中国文明信仰体系中具有核心意义，然而时至今日，这些不再新鲜的学术观点，可能尚赖阿城在公众阅读圈的影响来加以推广。毕竟一心“食古”的学术象牙塔中，能象北大李零那样读得了楚简，治得了方术，考得了房中，写得了杂文，游刃于专业与公众阅读圈两造的“活络丹”实在凤毛麟角。文化随笔确有补苴艰深考据的不可替代之功。

阿城原作中也有不尽从冯时处批发来的干货。譬如苗族服饰图案与古代文明图饰之间的激似，阿城据此相信苗民的造型艺术是由上古而来，经由代代巫师的守护流传至今。他称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东亚新石器文明的活化石，是中国文明之源的活化石”。这未免言之过切，从全书的支持证据来看，图片中所有苗族古衣都是近

代的作品，早期苗民的造型艺术原貌是否被这些近代文物完全拷贝保存下来，尚未可知。打一个比方来讲，不能因为今天中国流行十字绣，就证明了基督教十字架的原型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再者，从语言考古的角度看，苗语虽然与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族（苗瑶语族与汉语没有亲缘关系，与汉语接近的是藏缅语族），但苗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从语音层次上分析可知大多是中古时期，亦即隋唐之后由汉语借入的。这表明中古之后汉苗的文化接触渐趋频繁。极端的例子，如湖南城步的苗人青衣话，几乎已汉化为一种汉语方言。语言的借用往往是跟随器物文化一同而至，细绎书中“天极与蝴蝶”一节中的纹饰，与汉地常见绣花图样中的蝶、如意、蝠等样式非常接近。苗人史诗中有“蝴蝶妈妈”的母题，或许肇自更古的口头传统，但蝴蝶的造型来源，却很难摆脱与中古以来汉地文化之间存在接触影响的嫌疑。

《洛书河图》在冯时天文考古学基础上最大的发挥是有关“天极”纹饰的阐述，“天极”也是全书中篇幅最多的一章。冯时原书中的天极，也就是北天的中心，指的是北斗七星，但由于地轴偏移的岁差作用，天极逐渐从北斗移开，到今天的北极星已经与北斗星相差很远了。阿城受到冯时书中良渚玉器神像为天极神说法的启发，用上百张青铜器图片演示了商周至秦王权更迭背景下天极神崇拜渐趋陵迟。其中图189至195所揭图型，与“巫”字如十字架状的早期字型有相仿之处。以往学者，如容庚对商周彝器纹饰的研究，只专注于对称图形左右两侧各自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年4月

成型的现象，而对于图形中间起分隔作用的部分，却没有特别地予以关注，解读其象征意义。青铜器饕餮纹可能存在“移形借位”的视觉错觉，这应该是全书中最具原创力的发现，如果阿城将推论止于此处，那会是相当完美，但他的神侃要把天极引向太极图（河图、龙图）旋涡的中心，非要把图344虎食人卣底部勾龙头顶的菱形图案一并纳入到天极一系中来。于是就把在“河图”一章中提到的东方苍龙七宿心宿二大火星在上古天象信仰中的地位掷于一旁不顾。读者可参考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有关苍龙七宿小节，从红山玉龙造型到商代龙形觥背部心宿火星纹饰的发展，便可知较之天极星的说法，龙与心宿火星在上古信仰体系中显然是更合理的组合。

不过所谓“天文考古学”，究其实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虽然冯著的第一章便详述了天文考古学的身家源自，但权威的考古学教科书如伦福儒与巴恩所编《考古学》，并没有“天文考古学”的章节。在西方，天文考古学反倒是像一种高级形态的文化随笔，譬如对英国巨石阵的研究，埃及狮身人面像与三大金字塔的研究，往往会涉及史前文明等玄远难证的话题。其中翘楚者如汉考克的《上帝的指纹》，书中有关章节曾被Discovery频道拍成专题纪录片。从这一标准出发，我们也就能够接受阿城的《洛书河图》，毕竟一个不再写小说的大仙不必是好的考古学家。

最后提一下，绪论第5页第3段“彝族早在西汉以前就有高度发达的易学……”此段文字与天涯煮酒论史网友“背后有高人”于2012年2月27的帖中段落一字不差。

[点击查看原网页](#)

此中纠葛，似乎还应该请阿城专门说明一下。👁

海上书展纪事



刘柠

在这家位于陕西南路上的酒店的餐厅用早餐时，无意中望了一眼窗外，不禁吃了一惊：阴雨霏霏中，静安寺一带那一大片石库门的红色屋顶和上海展览中心主楼上的塔尖仿佛是透过滤色镜的景深，有种氤氲迷蒙的魔幻效果。于是，立马回房间，换了衣服，然后从酒店借了雨伞，出发。从著名的马勒别墅前面经过，上天桥，拐个弯，就到了本届上海书展的展场——上海展览中心。

这座于1955年竣工的苏式建筑，原来叫中苏友好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展览馆。一般人不会想到，战前，此地曾有过一座迷宫般美轮美奂的花园，即著名的爱丽园。八十年代，柯灵在《爱丽园梦影录》一书的代序文《爱丽园的噩梦》中写道：

爱丽园，即哈同花园，年轻人知道的大概不多了。花园也早已消失，沧海桑田，变成如今的上海工业展览馆。但只要稍稍

留心鸦片战争后上海百年来变迁的人，就不会不知道英国籍犹太富翁哈同（*Silas Auron Haroon*, 1847~1931），和他那宏伟神秘的私人花园。因为哈同是一位典型的“冒险家”，而爱丽园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观园”。

“大观园”变身工业展览馆，后又成了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其间的恩怨迂折，是耶非耶，是一整部中国近现代史探讨的问题，不说也罢。却说这个展览中心是上海“十大优秀建筑”之一，正门的墙上还贴着金属铭牌。同样风格的建筑，在北京、沈阳、长春等城市都有，且清一色是展览馆，我怀疑是出自同一版图纸的标配产品。小时候，我家就在北展附近。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塔顶上的金色五角星被将震下来，三年后才重新装上去。兴许是从小见惯的缘故吧，说实话，对北展我全然没有“违和感”。不仅不违和，甚至有种高大上

的感觉：剧场的座椅是真皮的，我在那儿看过芭蕾舞剧《天鹅湖》和歌剧《蝴蝶夫人》；“老莫”的西餐最牛逼，至今犹记得那被磨旧的不锈钢刀叉沉甸甸的质感。沈阳展览馆也算差强人意。但上海的这座苏式建筑，真是怎么看都不着调。苏俄风格与魔都的西洋范竟如此“犯相”，倒是真没想到。

雨，一直在下。买票的队伍，绵延数十米。不时有“黄牛”出没，价格要高出一倍，却也不乏成交。看来，书展宣传册子上所标榜的“书香上海”，还真不是虚言。排了四十分钟队，终于买到票，接茬排队安检入场，又是半个小时。排队时，见广场上停着防暴车。安检口处，黑衣特警，手牵警犬，如临大敌。意识到维稳时代的书卷气，到底来之不易，敢不珍惜！

好不容易进得展场，人已有了些许倦怠感。带着一丝疲惫，一头扎进人堆，一番拥来揉去之后，倒反而精神起来。反正我

在书展期间的唯一任务——一场关于日本近代转型问题的学术对谈，前一天下午已在长宁图书馆做过了，这会儿无事一身轻。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在场内转悠，漫无目标，下意识地期待着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书——特别是装帧，或在心仪的出版社摊位上邂逅编辑朋友——特别是美女编辑。结果，这两样都没辜负我。

虽说漫无目标，但对有些出版社，我是毫无期待，自然也不必特意挤过去凑趣。在中版集团展区，吸引我的是三联版“长声闲话”——李长声先生的随笔五种，小32开精装版。作者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责编是朋友。从签约之初，就在一路关注这套书的进展，终于在抵沪前一晚的饭局上，见到了样书，气象果然不凡。和味儿十足，与长声那纵论日本却绝无半点“和臭”的知日文字刚好合拍，可谓珠椽配套，相得益彰。饭局上初睹芳容，一册在手，细细品味，则是在书展上。



近年来，个人对上海古籍版书的兴趣大增，此番购得《张伯驹集》《李商隐选集》（周振甫选注）等四种。其中，《张伯驹集》近700页，除了诗词、词话外，还包括词话、画论和随笔，是一部绢面精装、不可方物的“美本”。上海译文社的小精装“窗帘布”系列，我一向是忠实的拥趸，此番发现了一册尚未入手的萨特的哲学著作《想象》（杜小真译），立马拿下。

世纪文景社以小清新著称，此番购得三种：万城目学的小说《鸭川六景》（涂愫芸译）、北大路鲁山人的随笔集《日本的味道》（何晓毅译）和止庵的《惜别》。《鸭川六景》是京都大学法学部出身的鬼才小说家万城目学，向在贺茂川（鸭川的别称）畔肆意挥霍的、满是荷尔蒙味道的青春的致敬之作。《日本的味道》，是日本最昂贵的国宝级陶艺家鲁山人的饕餮随笔——这位堪称最懂得食器之美的职人美食家，对食器所盛之物投去的温柔一瞥。《惜别》是一本怀念之书，深情之书，伤逝之书，叩问生死之书。除此之外，从书籍装帧的角度看，这还是一本少有的美之书——卷首画的落谷虹儿作品，是作者从日本淘来的珍藏；止庵范的书籍审美，被陆智昌的装帧设计贯彻到极致，细节完美得几乎找不出缺点。书中的主要章节，我原本就在腾讯“大家”上拜读过，书本身迟早也应该能从作者处获赠，但实在是经不住诱惑，当即买了一册，准备在旅次展读。

碍于寒舍日益逼仄的空间，我原本没打算在书展上买书，结果溜达了一圈下来，又买了十余种。不过，在书展上最大的收获，不是书，而是一张上海图书馆的借书卡

（e卡通）：只出示身份证，便可免费获得借书证，且无有效期（通常需要百元押金，书展期间免费）；可在从上海图书馆到区镇级图书馆中的任何一家借书，期满后还至对个人最便捷的任何一家即可；下载一个客户端，还可以享受远程电子阅读，阅读平台上整合了百万种图书、千余种期刊和百余种报纸。随借书卡一起领取的小册子上，有沪上全部的除大学之外的公共图书馆名录，粗略统计，有近300家。作为帝都人，实在对魔都的文化建设成绩艳羡不已。艳羡之余，不禁追问：北京还称得上是“文化之都”吗？

在展场上逡巡了近四小时，肩上的书包越来越沉重，便想找个清静去处，也好检阅一下书展的斩获。雨还未停，便打车径直到了绍兴路27号——汉源书店。摄影家尔冬强开的这家书咖啡，是我十几年前为《艺术世界》杂志写海外艺术专栏时代，约会女编辑之地，心灵驿站。阔别数年，温馨忆旧，古风忆旧，“汉源拿铁”忆旧，只是书台上多了一种拙作（山东画报版《竹久梦二的世界》）。点了一杯咖啡，坐享了两个钟点的时光和Free Wi-Fi，内心有种被老情人拥抱过的温暖的满足感。以前每次来这里，都会买一两本书。记得曾斥资近300元，买过刘香成、凯伦·史密斯编的世图版大型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此番造访，自然也不该空手而归。于是，敛走了一册南大版孟晖的《画堂香事》，深红色的细纹布面小精装，玲珑精致，透着我无比熟悉的杨全强范。

出了汉源咖啡，雨终于停了。绍兴路不长，从西头到东头，也就是三四百米的样子，安静得不像中国。在浓荫蔽日的法国梧桐街树下，渐次走过新开的OPEN Café，一间抽象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上海昆曲团，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社的小黄楼；小黄楼的对面，是杜月笙为四姨太购置的洋馆“笙馆”；快到东尽头，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大楼，“上海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牌子像一个惊叹号似的立那儿，唐突而醒目，仿佛提醒路人，巷子到头啦！

巷口处有个水果摊，也很有范，有点像京都的花店。站在水果摊的前面，回望绍兴路，不禁在心里想：在剧变的时代，迷恋一切不变，是一种时代错误。好在，这——我懂的。Q

罗德岛的自由



罗四鸽

“普罗维登斯 (Providence) 应该是你祖先命名的吧？”在罗德岛州的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山巅上，我站在罗德岛的创建者罗杰·威廉姆斯 (Roger Williams) 巨大的雕像后，问威廉姆斯的后人 Timothy Larson。Timothy 说是的。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随便一门美国历史书上都写了威廉姆斯的这段历史。只是我的英语实在太差，无法表达出我的潜台词。其实我想说，清教徒时期，普罗维登斯的存在实在是神奇，有些像欧洲大陆的荷兰。

十六、十七世纪的荷兰是一个神奇的国家。虽然是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成为世界的中心，被恩格斯称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我看来，更神奇的是其自由与宽容的精神。早在1579年，荷兰居民便拥有了信仰自由的权利。此时，自立门户自己做了英国国教领袖的英王亨利八世因离婚的事情，与罗马教皇闹翻有46年；对清教徒进行打压的詹姆士一世的以

证明“君权神授”的钦定版《圣经》，要32年后才在英国出现。就在整个欧洲大陆为天主教、新教、清教徒等不断分裂的宗教派别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荷兰竟然实行信仰自由，于是，这个只比台湾大一点的国家，成为了整个欧洲的避难所：胆小谨慎的法国人笛卡尔1628年躲在这里“我思故我在”，写着怀疑一切的文章，一写二十多年；1632年，难民的后代斯宾诺莎出生在这里，宁愿磨镜片得尘肺而死也不去大学教书；1683年，51岁的英国人洛克也逃到这里，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撼动了整个世界“君权”的《论政府》；之后，启蒙领袖伏尔泰在写了《哲学通信》后遭通缉，也于1734年逃到这里短暂避难。

实际上，清教徒起初也是先去荷兰躲避宗教迫害寻求自由的，之后，他们又认为荷兰过于自由和堕落了，于是，坐着“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1630年，波士顿的创建者约翰·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 带着一批清教徒乘坐阿贝拉号横渡大西洋, 在即将到达新英格兰的时候, 温斯洛普在布道时提出他们的理想: 建立一座理想的“山巅之城”。这座山巅之城也即后来的波士顿。可惜的是, 当这些清教徒在寻求自由的同时, 也不幸变成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人, 于是, 当时许多所谓的“异教徒”不得不逃亡罗德岛——那时的罗德岛, 正有几分类似欧洲的荷兰, 是许多人寻求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其中便有著名安妮·哈钦森 (Anne Hutchinson)。在温斯洛普看来, 这个女人“长舌头, 能说善辩, 比男人还厉害”。偏偏这位能说善辩的女人对于《圣经》的理解与麻省总督温斯洛普的不一样。虽然, 这位二十多年一直忙着怀孕生孩子又怀孕生孩子的十几位孩子的母亲, 从未在公共场合下发表过她的观点,

但她依然被捕了。据说, 在审判庭上, 她驳倒了当时波士顿最优秀的男性传道士、神学家和地方长官。当然这无法改变她被驱逐出去的命运。她那栋当时波士顿最大的房子被没收了。

“那哈钦森一家和你们家族有何关系?” 我明知故问。Timothy回答, 是的, 正是他的先人给当时哈钦森一家提供了庇护。1638年4月, 哈钦森夫人和她的十几个孩子, 还有追随者, 在雪地里步行了至少六天, 从波士顿走到了威廉姆斯的普罗维登斯庄园。她们本打算去纽约的, 但威廉姆斯说服他们到了罗德岛。得到威廉姆斯后人的亲口确认, 我兴奋地哇哇大叫, 仿若自己也亲自参与其中, 步行在三百多年前新英格兰的丛林里。

据威廉姆斯1636年1月的日记记载, 当时麻省总督温斯洛普和他的助手曾到

麻省的撒冷镇(Salem)试图捉住威廉姆斯,把他押送到回英国的船上。然而他们扑空了。威廉姆斯在三天前便已经逃去了罗德岛,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普罗维登斯庄园。此后,五十多年里,这座庄园成为当时宗教自由的代名词,分离派、浸会派、追寻派、唯信仰论者、贵格会教徒,以及犹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普罗维登斯或许比波士顿更像一个典范的“山巅之城”。因为威廉姆斯在这里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便是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虽然罗德岛州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州,但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将公民权与宗教信仰分开的地方。100多年后,托马斯·杰弗逊将这条原则写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那句著名的话,“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分离之墙)”正出自罗德岛州的威廉姆斯。

而在欧洲,政教分离经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努力,即便是最为自由与宽容的荷兰,到了1848年颁布的《荷兰宪法》才将教会与政府分离开来,比威廉姆斯在罗德岛创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晚了200多年。

当然,罗杰·威廉姆斯的伟大之处不仅于此。此外,他还是北美第一个要求废除奴隶制的人;他还学印第安语,与印第安人进行平等贸易的人。近代埃及学者穆罕默德·阿布笃(Mohammed Abdu)在

1895年说,“我们埃及人曾经相信英国的自由主义和英国人的同情心;但是我们不再相信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到你们的自由只属于你们自己,你们对我们的同情只是狼对它要吃掉的羊的同情。”若是仔细看,波士顿的自由亦有如此味道。当“五月花号”下来的清教徒与印第安人度过第一个感恩节后,便开始不信任他们,甚至不能容忍印第安人的信仰,最终导致1675年菲利普国王战争。然而,罗德岛的自由则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且因为政教分离的原则,才实现了真正的宗教自由与思想自由。在罗杰·威廉姆斯身上,我看到一种自由的精神。

关于自由有很多定义。我最喜欢美国大法官勒恩德·汉德的定义:“自由的精神就是,自我怀疑而不唯我独尊;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就是,兼顾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自由的精神要求人们牢记,即使是一只坠地的麻雀,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在普罗维登斯出生长大的Timothy,在开车带我们游玩罗德岛后,特意开车到了普罗维登斯,盘山而上,看伫立在山顶的罗杰·威廉姆斯的雕像。那时,已近午夜。威廉姆斯俯瞰着整个城市。山脚下,是他创立的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也是美国第一座第一浸信会教堂。这是威廉姆斯逃离麻省后,在罗德岛寻找到的自由。Q

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上)



刘柠

对世界各国人均购读量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是不折不扣的读书大国。这一点,基本无需诠释,只稍稍留心一下东京电车上和车站、咖啡等公共空间的阅读风景便可了然。而读书大国的有效支撑,则是书业大国和书店大国——没了后两者,阅读便成了无米之炊。所谓书业,顾名思义,即生产图书的产业——出版业?但我个人话语中的出版业,则是包括了新闻媒体(特别是杂志)在内的广义内容产业的概念,或者叫做“大出版”。而书店,按理说应该算是书业的一环。但为了谈论的方便,我们权且把这一环拎出来,作为与出版相平行的课题,来单独探讨。

先从书业谈起。拟围绕新闻媒体、图书出版、出版的激励机制和出版业的“东洋标准”这四个层面来展开我对东瀛书业的观察。

新闻媒体

我为什么选择从新闻媒体的视角切入出版问题呢?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媒体与出版(这里指图书出版)很多重合的“交集”。日本的媒体,特别是杂志,很多是出版社在办。如著名的讲谈社旗下,盛期时有百余种杂志,甚至出现所谓“杂高书低”(即杂志的销售额高于图书码洋),以志养书的现象。媒体大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且很多是重要的大型出版社,如大报中的朝日新闻出版社、每日新闻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杂志中的文艺春秋出版社等,都是出版业巨擘。

其次,媒体是出版的“底本”。以动辄数百万份,甚至上千万份计的大报为龙头,海量发行的报章杂志,几乎达到(每日)全国人手一纸(志)的程度(日全国人口目前约为1.27亿)。日复一日,媒体生产线上产出的天文数字单位的内容产品,除

了一部分单纯的信息之外，其余相当的部分，会直接转化为图书出版的内容，如报纸和时政、文化类杂志上文艺副刊中的专栏和虚构、非虚构作品的连载。

第三，人才也高度重合。现代大众传媒与大学一样，是思想和新知的熔炉。尤其是日本媒体，高度的精英化和广泛的覆盖，优秀的畅销书作家和学者辈出，代有人才，各领风骚。如前《文艺春秋》杂志政治记者、曾以《田中角荣的金脉与人脉》的调查把田中角荣拉下马的立花隆，转型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笔者的友人、已故《东京新闻》编辑委员清水美和系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著述颇丰；腾讯“大家”的签约专栏作者野岛刚则是《朝日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作家，致力于日文和中文双语写作，在中日两国出版了多部非虚构作品。

日本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的距离很“近”，甚至有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态势——“螳螂”是报刊杂志，“黄雀”是出版社。即报刊杂志是上游，是中间产品，而出版社是下游，负责“收割”，推出的出版物是最终产品。譬如，有一种刊物叫综合杂志，或者叫“论坛志”

(Opinion Magazine)，月刊，很厚，像书一样，如《文艺春秋》杂志，平均有524页。这类杂志，为日本所特有，与大报一样，多系战前就存在的百年老店。在内容上，顾名思义，像一个论坛一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时评、调查、政论，到随笔、小说、书评，一应俱全，要啥有啥。其中，还包括大量连载，虚构和非虚

构都有。多的时候，十个八个连载同时开张，不在话下。不用说，这些连载，大多与出版直接捆绑，一俟连载结束，马上会推出单行本。如2014年8月，《文艺春秋》上连载的村上龙的小说《老恐怖分子》(オールド・テロリスト)终于迎来了最终号(第39回)。可以断言，如无意外，同名单行本小说不日即将由文艺春秋社推出。这种论坛志，七八年前，有十数种，且政治立场左、中、右俱全。近年来，受制于日本国内舆论磁力场的变化和出版不景气，急剧减少，目前只剩下《文艺春秋》、《中央公论》和岩波书店的《世界》等数种，但都是重要的舆论和出版平台。

这种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双向互动的现象，并不唯东洋所独有，却以日本为盛。特别是在互联网资源整合加速的今天，媒体与出版的边界日渐模糊，乃至所有谈论大众传媒的著作，必论及出版，反之亦然。

图书出版

东洋出版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天正十年(1582)，基督教传来日本未久，日本向欧洲派遣了由四人组成的少年使节团。他们回国时带回了铅铸活字和木制印刷机——此乃西洋活版印刷术舶来日本之初。日人开始仿造活版，以罗马字、汉字和假名混用的表记方式，印刷《圣经》等基督教书籍，称为“传教版”(キリ



シタン版)。但由于此前，从中国传来的木版印刷已然在日本落地，并用于印刷经文，这种从西洋舶来的活版印刷未能在东洋生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民间出版业。江户时代，基于整版印刷术（一种比活字印刷术更先进的、适用于大量印刷的印刷技术）之上，由版元（出版社）、问屋（中盘商）、本屋（书店）及贷本屋（图书馆）构成的书业已相当发达，酿成了由浮世绘、滑稽本和人情本（插图版恋爱小说）构成的活色生香的前现代出版文化（即所谓“和本”文化）。

日本现代出版业，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甚至更早一些，滥觞于幕末时期。经过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洗礼，迅速成长，大正时期已有相当规模。昭和元年（1912），由改造社推出的“元本”（即书价仅1日元的廉价文库本），一

扫此前清一色豪华本的陈腐风气，为出版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最初的“文库热”，是在一战前后，距今刚好一个世纪。至二战前夕，日本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岩波书店、文艺春秋、讲谈社等出版大鳄和岩波茂雄、菊池宽、野间清治等名出版家。

战后，出版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而且是消费社会的推手，一路高歌猛进。即使在经济复兴时期，出版物的发行量也在飙升；甚至遭遇石油危机（1973年）的挫折，增速都未见放缓（出版种类和码洋都在增长）。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版业仍维持了五六年的增长，至1996年达到峰值。接着，是漫长的不景气时代，出版业开始衰退。出版社从盛期时的4612家，减少到3734家（2011年数据）；出版新书种类从每年8万多种，降至

7.9万种，总发行量为13亿册。与出版衰退同步发展的，是读者阅读趣味的“脱活字”化和多元化：从1995年秋季开始，个人电脑逐渐普及；接踵而至的，是手机。这种“四六时中，人手一机”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环境，在此前录像带文化的基础上，个人消费开始向电玩、动漫和流行音乐等后现代文化产品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要想“破局”，只能拼命扩大品种，同时减少印数。结果是，出版社、中盘商和书店三者“共谋”的“新刊主义”（“新刊”，日文中意为新发行的图书）越做越大，尾大不掉，退货率居高不下（约为40%），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粗制滥造和资源浪费。

不过，虽说如此，在出版持续不景气的1997年以降，仍不乏百万级畅销书（Million Seller）。如《五体不满足》、《傻瓜之墙》（バカの壁）、《国家的品格》（国家の品格）、《哈利·波特》（日文版）、《1Q84》等，均发行200~500万册。去年（2013年度）的第一畅销书是村上大叔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2013年4月，文艺春秋社初版）。据说上市第七天，销售便轻破百万册大关。可以说，东洋出版业自大正以来近百年的现代化深耕，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高度依存的状况，及作为这二者共同酿造的结果——一个“书香社会”，使所谓“出版大崩溃”（2001年日本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的神话成了伪问题。

激励机制

日本出版繁荣的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旨在鼓励创作、奖掖阅读、刺激发行的激励机制。尽管这种机制在本质上仍是商业的，但由于其对文化的倾斜性投入、程序设计的公正和操作的透明，大体保证了其有效运作，成为出版的“酵母”和“催化剂”。拟从两点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一是广告和书评，二是文学奖项。前者的主体是新闻媒体，而后者主要由出版社和书店主导（也有一部分奖项由媒体创设，如读卖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等）。

大凡游历过东瀛者，都会对东京、大阪电车上一排排悬挂的车内广告惊叹不已。如果细加观察，便会发现，其中相当的部分，是各类杂志和书籍的广告。翻开《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抛开一周一期的书评版不说，占据头版、二版等重要版面的广告，往往是图书广告。一些实力雄厚的出版社推出的大畅销书广告，动辄占据报纸的一整版，不在话下。如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文库版、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新装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日译新版出版时，都在《朝日新闻》等大报上做过整版彩色广告。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面向主流知识社会定制发行的报纸如《南方周末》，整版插页广告也多是西门子、日立、海尔等上市公司，图书广告登陆大报几乎是天方夜谭。

从这里，亦能看出日本新闻媒体对出

版等文化产业的重视。要知道，日本出版业的整体规模即使在鼎盛期的1996年，也不过是2.6万亿日元（指码洋）上下。经过连续17年的下滑，到今天已经缩水了35%，2013年度为1.69万亿日元，只勉强与一家中型电机公司松下电工的销售额相当。试想，如果没有新闻媒体对出版业的倾斜政策的话，哪怕是利润最高的出版社，怕也休想在《朝日新闻》等“高级纸”上做广告吧。

媒体对出版的支持，除了广告，还有书评。日本出版界有所谓“书评三千”的说法，意思是一本出版物，只要在报纸上发表书评推介，实销量便不会低于3000册。主流大报都辟有书评版，请各自签约延聘的书评委员撰写书评，力求“理中客”。这些书评委员均为各学科领域成就卓著、世所公认的专家学者，独立于媒体和出版社，以立足于专业标准之上的个人趣味推介近期出版的学术新刊。如目前《朝日新闻》的书评委员有21人，其中不乏国人熟悉的学术大家，如艺术家横尾忠则、作家赤坂真理、哲学家柄谷行人、历史学者保阪正康和建筑师隈研吾等。

日本是不是文学大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日本肯定是一个文学奖大国。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和学术著作奖，对出版也是一种“催化剂”。战前由文豪菊池宽创设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和大众文学奖直木（三十五）奖，有近80年的历史，一年两度由文艺春秋社主持评选，是新晋作家成功的“窄门”。因寒暑假等原因，日本杂志在2月和8月是发

行低迷期。为振兴销售计，文艺春秋社专门在这两个月评选芥川和直木奖，被称为“二八对策”。其中，芥川奖的获奖作品会在3月号 and 9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全文刊载（日本的月刊通常提前一个月发行：即2月发行3月号，8月发行9月号）。如笔者手头的这本《文艺春秋》新刊（9月号）上，便全文发表了荣膺第一百五十一回芥川奖的大阪府出生的70后女作家柴崎友香的小说《春庭》（春の庭）。不消说，一个月后，小说的单行本便会由文艺春秋社出版，且十有八九是畅销书。顺便提一句，今年8月，荣膺第五十七回群像新人文学奖，并被第一百五十一回芥川奖提名的一部小说《我辈成猫》（我輩ハ猫ニナル，讲谈社，2014年7月初刷），是冈山出生、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80后新锐小说家横山悠太。作品描写一位中日混血儿为更新签证，离开上海的亲人赴日，在遭遇一系列文化震荡后，终于在御宅族（otaku）圣地秋叶原落脚的故事，不失为一部诙谐、另类的中日文化比较论。

除了芥川、直木奖，对小说、随笔和非虚构类作品，著名的奖项还有野间文艺奖、三岛由纪夫奖、川端康成文化奖、太宰治奖、谷崎润一郎奖、吉川英治文学奖、泉镜花奖、山本周五郎奖、大佛次郎奖、江戸川乱步奖、新潮社新人奖、日本SF大奖、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日本恐怖小说大奖、日本手机小说大奖，等等，不一而足。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各种学术作品奖：如上文提到的著名记者清水美和先生曾以中国问题的学术专著荣获2003年度亚洲太平洋

奖特别奖；另一位常驻中国的著名政治记者矢板明夫先生，以习总书记的传记荣膺第九回檉山纯三奖。这是一个新近创设的学术著作奖项，专门奖掖用日文出版的东亚研究秀作。

日本的出版奖项多则多矣，但游戏规则公正，评奖过程透明，还真没传出过诸如我国的长江学术奖、鲁迅文学奖一类的乌龙八卦。但近年来，在文艺界和普通读者中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认为既成的文艺奖项多系出版社和新闻媒体的“自作自演”，过于保守、自恋，在出版不景气的时代，已不能反映书业的现状，不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理应打破云云。首先“破局”者，是“本屋大赏”（即书店大奖）。2004年，在书评书店文化志《书的杂志》（本の雑誌）的动议下，书店业者成立了一个NPO机构——本屋大赏实行委员会，并通过这个机构，来评选书店大奖。这个奖的最大特点，是民主：作家、学者一律不带玩，由实行委员会组织全国新书店的店员（包括派遣雇员和临时工）自主在线投票，一人一票，按三个类别（“最有趣的书”、“最想卖的书”和“最想荐的书”），分别提名过去一年中的好书。再由该机构唱票、统计，最终产生10本好书。在第一回颁奖式上，《书的杂志》总编辑浜本茂高喊“打倒直木奖！”的口号，博得了满堂喝彩。毋庸讳言，书店大奖的获奖作，多系畅销书，后被改编为影视剧脚本，搬上银幕者甚众——书店业者到底不是吃素的！

如此，正是通过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专业化的书评和既富于悠久的传

统、权威的学术性，而又不拘一格的各种出版奖项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日本出版才能在不景气的时代维系其精英气质于不坠，在产业规模整体缩水的情况下，力求最大限度地凸显品质，追求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适度繁荣。

东洋标准

我本人作为一介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来，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异型本增多，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不得不为藏书空间而犯愁。后来，待我进入某家出版社短暂工作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默契的“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如此“出版文化”真害人不浅：“杀空间”，资源浪费，环保问题，对书价造成直接影响，酿成恶性循环。

日本出版史上，也有过类似好大喜功的“恶趣味”时期。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成功人士”争相用成套的精装大开本书来装饰书房，书籍成了价格不菲的“壁纸”。今天去神保町、早稻田一带，旧书肆中有大量的文学全集，精装函套，有些还是真皮面，是真正的豪华本。但由于过于挥霍空间，且印数庞大，基本上沦为打捆堆在店前路边上等待贱卖的命运。“移风易俗”后，代之以开本小巧实用、装帧简洁素雅的审美趣味，且书目繁多，森罗万象，无所不包。在出版业持续衰退的大气候下，过去十五年来，小开本市场却异常坚挺，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码



洋的缺口。

主流出版物按开本大致分为三类：单行本、“新书”和文库本。单行本与中国一样，有大小32开之分，有精装本，有简装本，也有软精装，但以硬精装（Hard Cover）最为普遍。这三类主流产品，各有其职能分工，相辅相成，基本上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主干，我称其为现代出版业的“东洋标准”。

“东洋标准”中的两个主要版型，一是文库，二是新书，说来都是从西洋“拿来”的。所谓文库版，即A6版（148×105mm）袖珍口袋本，历史逾百年。日本最早的文库本，是1893年博文馆出版的“帝国文库”，是厚达1000多页的精装豪华本，与今天“文库本”的概念相去甚远。一般认为，东洋现代的文库版，是受德国“雷克拉姆文库”或“卡塞尔文库”的刺

激而产生的，滥觞于1903年，由富山房创刊的“袖珍名著文库”。1914年，新潮社刊行“新潮文库”，比今天通行的A6版标准规格略小一些。1920年，岩波书店推出“岩波文库”，旨在以低价格刊行名著，普及学术。“岩波文库”至今仍在延续，真正是文库本中的百年老店，内容从古希腊先哲，到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从黑格尔、康德，到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可谓兼容并蓄，对文化启蒙功莫大焉。除了“岩波文库”外，还有改造社的“改造文库”，春阳堂的“春阳堂文库”，东洋出版史上的第一次“文库热”，在战前便形成了。我收藏的最早的一册文库本，是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塔·苦闷的象征》（象牙の塔を出て・苦悶の象徴），1933年11月由改造出版的“改造文库”。

1949年，角川书店创刊“角川文

库”，与“岩波文库”、“新潮文库”并称为三大文库。战后，又先后掀起过四次“文库热”，被卷入其中的出版社所在多有。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2013年的统计，目前共有85家出版社在同时发行192种文库本丛书，其中颇不乏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畅销书(Lang Seller)：如“岩波文库”中占据第一位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托篇》(ソクラテスの弁明・クリトン)，共发行164.2万册；“新潮文库”中的首位是夏目漱石的《心》(こころ)，发行实绩是691.05万册。

按东洋书业的行规，在杂志(或报纸)的连载结束后，出版单行本。单行本付梓三年，待码洋达到一定水平，成本回收后，推出文库本。但近年，这个不成文的陈规已有被打破的态势，如2010年开始进军文库本市场的实业之日本社，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劫持白银》(白銀ジャック)于某杂志的连载结束后，并未经过单行本，而是直接推出了同名文库本，大获成功，热卖逾百万册。

另一类袖珍本出版物是“新书”版，标准规格为173×106mm，比文库版略微瘦长一些。此“新书”并非指新近出版

的新书，而是这种开本的出版物统称(日文中，相对于“古本”，新出版图书叫“新刊书”)。新书的历史比文库浅，但也基本上是战前从西洋舶来的文化。1938年，岩波书店模仿一年前英国创刊的“企鹅丛书”推出了“岩波新书”。与主要刊行经典的“岩波文库”不同，“岩波新书”的理念是“以现代人的现代教养为目的”，向国民普及新知。如此出版理念，至今不渝。新书作者多系各个人文社科分野中公认的权威学者、学术大家，面向一般读者，以去专业化的形式，介绍本学科的前沿动态，要求是生动有趣，提纲挈领，是一种普及型的标准化知识产品——岩波书店甚至对新书的篇幅都作出过明确要求，平均为224页。

新书文化在战时受到遏制，未能做大，战后却被广泛接受，成为与文库本鼎足并立的主流产品，并衍生出一些延伸性产品(后文论及)，为东瀛书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点缀着纸质出版作为所谓“夕阳产业”的黄昏之美。

以上，是对东瀛书业的一个个人视角的粗线条扫描。❶

(未完待续)



吴强

现代的民主是后RAF的民主



灵子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这部德国电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吴强在他的课堂上放映过不下五次。他会借此向学生们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风潮中，德国红军派（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兴起、发展与衰落的历史。

RAF，德国一度人人知晓的极端主义组织，自1968年组织法兰克福百货大楼纵火案以来，在近30年的活动中，犯下34次谋杀案，多次银行抢劫案和爆炸袭击案，造成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直到今天，关于RAF的讨论和思考还屡屡见诸德国媒体报端，而2008年拍摄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一经上映，更是引起德国观影热潮，并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吴强记得，他在此片上映近半年后才去慕尼黑的影院观看，晚上十点半的场次，影院依然爆满，甚至有观众直接站在廊道台阶上看。影片时长150分钟，凌晨一点才散场，在片尾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的歌声中，观众们默默离席，几乎没有一个人讲话。

“德国人至今还在反思红军派的历史，就像他们从来没有一刻忘记大屠杀。”吴强介绍。如今每隔几年，有关RAF的新闻总会上一次《明镜周刊》封面，可能是因为RAF前成员新近被捕，或者某位被判终身监禁的成员要求提前假释而被驳回。2008年有

调查显示，有不低于30%的德国民众同情RAF。

“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关注和讨论RAF的原因。”旅德近十年的吴强，拥有德国汉堡大学欧洲法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对德国社会、文化、政治长期深入的观察，使得他将研究方向逐渐聚焦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社会运动、新媒体政治、欧洲政府与政治。

“事实上RAF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民主是后RAF的民主，到今天德国人还在享受RAF留下的遗产。”

极端主义是被警察暴力催生出来的

问：德国红军派（RAF）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吴强：直接的导火索是两件暴力事件。一是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德，引起德国民众的普遍抗议。那时巴列维在伊朗国内搞独裁，镇压异议人士，人权纪录臭名昭著，但是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为了石油美元与其签署合约，签了上百万的订单，还给予巴列维最高礼遇。这在今天的我们也是相当熟悉的，民主国家与流氓国家的媾和。当时在柏林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过程中，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被德国警

察射杀，这引起了学生的公愤。

二是1968年4月11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主席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遭到枪击。杜契克此前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在柏林呼吁大家参与世界革命。由于他来自东德，一直被德国保守派媒体《图片报》激烈攻击，称他是共产主义阵营派来的间隙。一个来自斯特加特药房的学徒工受到这种舆论煽动，在街头拦住杜契克，向他连开三枪。

这两件事是促使RAF诞生的直接源头。换句话说，这个组织是被当时德国的警察暴力滥用催生出来的。



INTERVIEW

问：RAF诞生于联邦德国政府治下的西柏林，如何理解它警察暴力的一面？

吴强：刚才说到警察射杀学生的事件就是一例。后来，那位警察受审，但是被无罪释放。也是在那次抗议中，不少伊朗特工混迹在人群中，举着欢迎巴列维的牌子，转头就殴打示威者。这在影片中也有体现。而德国警察纵容了这些伊朗特工的做法，完全不加干涉，并且事先准备好了很多预案。

这种警察暴力的滥用与当时的大背景相关，“冷战”格局、越南战场、德国的大联盟政府（由不同政治倾向的基民盟、社民党、自由党等联合组成）……警察在要求不断加大权力，加强社会管理。甚至后期有资料爆出，RAF早期所采用的鸡尾酒炸弹和枪支武器，都是由西德警察秘密提供和传授的。

这是很有趣的，一方面，警察暴力引起极端主义，另一方面，警察也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个话题可以有机会专门再谈，警察如何对社会运动进行控制。这就是它警察国家的另一面。就像阿伦特所说的，任何一个民主制度下，人民一旦麻痹自己，不保持清醒与节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民主体制随时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极权体制。

问：当时RAF的诉求是什么？

吴强：RAF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产物。我们知道，1968年，在冷战格局下，反对资本主义、官僚精英的抗议运动席卷整个西



方，在欧洲和美洲都非常热烈。当时在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等国家，都有不同的左翼革命组织。在德国，人们普遍不满战后二十年来民主的发展，认为民主体制被资本家、大联盟政府绑架了，正变得越来越“虚伪”，并且抗议前纳粹成员仍然在现政府中担任要职。

正因此，RAF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大资本家与政府高官，针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和国家暴力的代理人，没有针对平民



的事件。比如，抢劫银行，轰炸驻西德的美军基地，暗杀德国联邦总检察长Buback、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会发言人Ponto、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Schleyer等等。只有一件事除外，就是针对《图片报》的出版方斯普林格出版社所进行的爆炸案，而且那一次他们提前做了预警，但是预警被忽略了。这是唯一致使平民伤亡的活动，也是后期RAF领导人一直争论的焦点，不断检讨当时是否处理不当，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行动，并且这种争论最终导致了第一代领导人迈因霍夫的自杀。

问：巴德尔和迈因霍夫，RAF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一个怎样的组合？

吴强：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里面展示的比较戏剧化，好像巴德尔就是脾气暴躁的行动派，而迈因霍夫是一个理论家，事实当然没那么简单。安德里亚斯·巴德尔本人有非常深的理论修养，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清晰的认知。他在1971年还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论城市游击战》，这篇文章是很著名的关于城市游击战的理论文献，关于城市的反叛政治应该怎么搞，它的正当性、合法性在哪里，等等，做了很充分的解释。这篇文章迟到2003年才被翻译为英文，为英文世界所知。实际上它自1971年开始就

在德语世界中成为游击战重要的指南，文章不长，但是非常经典。（中文译本还没有，我希望能把它译出来。）

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本来是一位知名的专栏记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发展历程也很有意思，从一开始因为工作关系被卷入，到后来成为RAF的领导人之一。她代表着德国知识分子对RAF的同情和参与程度之深，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在RAF对公众的影响力方面，迈因霍夫起了巨大的作用。她不断撰写文章，给公众一个框架，帮助大家理解RAF的行动。

这种一男一女的领导人结构，在RAF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中也延续下来。女性在红军派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他们表现出了一种自组织的方式。比如二三代领导人的大部分行动已经不受第一代领导人的直接指挥。今天的基地组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明显，完全是自组织、多中心的方式。从战术来说，这是有可比性的。你记得《巴》影片里，德国刑事警察的负责人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主要的RAF成员都被抓了，但还是有极端行为在不断发生，他不明白驱动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直接的原因，就是RAF是自组织的，更大的背景来看，只要还在“冷战”格局下，只要越南战争还在继续，这种动机就会一直存在。



这是缺失父亲的一代，对上一辈的反抗

问：RAF的成员有什么共同特点吗？

吴强：这是很有趣的一点。与其他国家左翼组织不同，德国的红军派来源非常单一。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女，他们的父亲要么是在“二战”的战场上死亡，要么就是被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返回。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战争中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的，是没有父亲的一代。现在有很多文章分析这一代人，认为他们的反抗实际上有一种心理的投射，父亲的缺失造成了他们对父亲的恨，对不存在的父亲的恨。这种恨转为了对战后德国政府这套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认为它是虚伪的民主主义制度。

这种虚伪的民主在战后有很多表现，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基民盟阿登纳所主导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军占领情况下实现的民主。这个政权几乎保留了全部纳粹时期政府的高官，100%的法官，90%以上政府的官员都被保留，所以我们通常说老纳粹以各种形式隐藏潜伏在新的民主政权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之前我们说的警察暴力也有它纳粹化的传统。

这就成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痛恨和反抗的对象。他们认为是要消灭这些老纳粹、旧纳粹的法西斯分子，所以要采取武装斗争。所以，RAF的反抗，很大程度

上是一个代际的反抗。即便他们的父亲只是国防军的士兵，只是执行命令，并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父亲是有罪的，必须由上帝来审判。他们实际上是反抗他们父亲这一辈。

问：“二战”之后德国致力于“去纳粹化”，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但为什么还是会有纳粹体制残余？

吴强：当时重要的纳粹分子，比如战犯，当然都被送去审判，但是其他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像施密特、海德格尔，他们在大学的公职是被剥夺了，但研究等自由仍然在民主制度下被保障下来。另一方面，大量普通人被甄别为只是协同者，没有确切的罪行，无法用当时的法律来审判他们。换句话说，这些跟随者是遵守了纳粹当时的法律，你不能用一个新的法律、新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们当时的罪行，除非你用当时的法律证明党卫军军官当时就是在犯罪。所以，更多的人只能接受雅斯贝斯所说的道德的审判。那实际上这个体制就被保留下来。

那么社会的重建怎么开始？就是靠培养一个新的力量，进步的、健康的力量，来逐渐地淘汰，而不是把旧的体制里全部人的5%都看作坏分子统统枪毙。这是一个政治代谢的过程，是新生力量与旧的力量



INTERVIEW

争，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代人的冲突。很多时候政治的发展是很长时段的，往往需要一个代际之间的成长和反抗才能延续，比如像中国，这一代中产阶级刚刚形成，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一代表达不满与反抗，而只能寄望于中产阶级的下一代，比如90后、00后的成长，达到公民社会的建立。

德国的学生运动就是重建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包括哈贝马斯195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做演讲，号召所有学生：你们今天所有人首先不是学生，而是公民。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在1967、1968年，群众都在反

对警察国家的暴力，反对民主体制跟伊朗这样独裁体制的媾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健康的力量。

问：所以RAF也是重建社会的力量中的一支？

吴强：是的，只不过他们的斗争方式激烈一点而已。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公民社会继承了他们的这些主张，在八九十年代继续通过各种各样的抗议方式在推动他们。68学生运动之后，反核运动取而代之，一直推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成员肖像



动着今天我们看到的气候政治、能源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看到68运动中上街的费舍尔，后来在施罗德政权中担任外交部长；席勒，70年代RAF的辩护律师，后来成为社民党成员，90年代担任施罗

德政权的内政部长。68一代最后都成长起来，变为德国政坛的领导人，开始推动德国政治往更民主的方向去走。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

民主得到充分发展，极端方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问：德国主流舆论今天是如何看待RAF的？

吴强：当时片子公映之后有一个民意调查，30岁以下的年轻人里有25%是支持RAF的。前不久的一个民意调查则显示，德国公众中仍然有相当高的比例，大概超过了30%，同情RAF。这是非常有趣的德国社会现象。

我一直在强调，RAF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极端主义，这在最近十年的德国公众舆论当中，在法律、政治讨论中，有非常清晰的辨别。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在遵守现有体制与法律，并不是想要推翻本国政府，他们是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人民的声音。换句话说，极端主义再极端，也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他们的做法当然是刑事犯罪，但刑事犯罪是社会运动中所无法避免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当然这很复杂，我不能直接说他们的暴力是对的，但也不能简单说暴力就是错的。

问：RAF在当时到现在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

吴强：有坏的也有好的。坏的一面，正是在对付RAF过程中，警察制度被加强。大量的警察国家的社会控制手段加强，严密化，警察权力甚至因此提高。影片中对此也有体现，一开始，警察头子希望扩大警察权力，要求换发所有公民的身份证，建立健全所有公民的身份系统，加强国家的管控。这是警察国家看不见的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60年代末，他们就大量使用当时的电子计算机，当时无论IBM还是西门子，还是用纸带的，数据保存速度是很慢的，我们现在一个手机绝对超过60年代末所有电脑的计算能力。当时计算能力是几十万次的。主要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德国不需要为战争做准备，但是需要为对付RAF做准备，居然储存了一万人的指纹，建立了公民的档案，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对此很熟悉，可以联想到，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可



以建立大数据的系统，把所有身份系统都聚集起来。这种工具理性非常可怕，可以用来加强监视，结果就是所有想逃避监视的人。比如在德国付房租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签转账协议，那么那些用现金付房租的人一定是可疑的，调出名单，筛查他们的身份、社会关系网络等等，就可以锁定人选。

好的方面也有，比如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一直在展开。包括他们所反对的美军占领，反战诉求，呼吁的监狱的人道主义，等等，都造成了实际的影响，被公众所知。原来公众视作国家权力中当然的一部分东西，越来越往公开化、人道化的方向发展。

更广义的意义上讲，极端主义也被接受，只要不对宪法秩序不发生挑战，任何极端主义方式都是可接受的。这是德国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迟到21世纪初才普遍被接受，在他们90年代末解散之后十年，因为，审判还在继续，对前成员的抓获还在继续。新一代的政客以及公众，对于RAF的关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每隔几年都可以在明镜周刊看到关于RAF成员的报道和消息，每隔几年他们成员要上一次封面，或者是出狱的消息，或者是宪法法院驳回了他们要求假释的要求。这么小一个问题都可以上明镜封面，可以看出公众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放弃思考，就好像公众从来没有放弃对大屠杀的思考一样。

现代的民主，某种意义上讲，是后RAF的民主，德国人在享受RAF创造出来的空间，就像整个欧洲社会在享受大屠杀之后的

反思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方式，种族的、排外的方式，来保持一个国民的效忠。比如1996年巴尔干危机爆发，如果我们认定巴尔干在发生种族屠杀，国家社会必须有义务来干涉，不能让纳粹的行为重演。这是大屠杀的遗产。那今天欧洲社会享受到的对于极端主义的容忍，比如对于极右翼组织的容忍——极右翼组织的政党仍然是合法的，成员仍然是合法的，只是它的宣传是非法的——对结社自由的保护，都是在RAF之后出现的公众认知。对于这种极端主义要容忍，当然他们如果有犯罪，那当然要依法制裁。这是真正的公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由此来监督批评政府。我们说勃兰特不是突然地、自发地就在华沙下跪反省，代表一个国家向一个民族道歉，如果没有68学生运动的推动，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问：RAF的活动是如何沉寂下来的？

吴强：1977年，第一代领导人在狱中自杀——原因到现在也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他们在做最后的抗争表达——RAF就相对沉寂了。80年代，他们还有一些活动，甚至在1984年、1985年一度达到高峰，但都是小规模袭击。特别是，他们在80年代宣布，跟意大利的红色旅合并为统一的组织，因为他们人数越来越少，之后实际上是意大利红色旅的行动更为激烈。

真正的分水岭是“冷战”的结束，因为自由主义已经获胜，我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INTERVIEW

了, 他们的反抗似乎也丧失了意义。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价值, 没有必要以极端的方式来推动,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搞。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支持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冷战”之后, 整个欧洲开始重新认识到公民社会的意义, 不光是苏联东欧, 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开始搞比如“保龄球不能再一个人打”, 民主怎么运转等等, 政治、学术、公民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90

年代之后, 民主运动更多是采取参与的方式, 各种各样基层的民主、协商的民主、审议的民主大幅度发展。这些方式只要得到充分发展, 那么支持极端方式搞民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新的极端主义, 实际上是境外的力量, 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出现, 变成了宗教间的、文明间的斗争。那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另外一个问题, 新的故事在上演。Q



– three fisherman –
Gaetano Cappiello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